



第一部
雙頭鷹

他的地位，在歐洲和亞洲、過去和未來都無人能及。這是世界上聲名最顯赫的人，也是最神秘莫測的人。

——亨利·巴比斯 (Henri Barbusse)

《斯大林》(1935)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具有版權的資料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俄羅斯雙頭鷹棲居的地域之遼闊，過往或之後的國家無一能及。那裏不僅有聖彼得堡的宮殿和莫斯科的金色穹頂，還有講波蘭語和意地緒語的維爾諾*和華沙，德意志人建立的波羅的海港口里加和雷瓦爾†，講波斯語和突厥語的綠洲布哈拉和撒馬爾罕（帖木兒墓葬所在地），以及太平洋附近薩哈林島上的阿依努人。「俄羅斯」包括肥沃的烏克蘭險灘和哥薩克村落，西伯利亞的沼澤和陷阱。其疆界遠達北極和多瑙河、蒙古高原和德意志。高加索山脈的屏障也被突破並圈入其中，讓俄羅斯延伸到黑海和裏海，與伊朗和奧斯曼帝國接壤。帝俄的宗教紛然雜陳，有大量的正教教堂、清真寺、猶太會堂、舊禮儀派教徒的祈禱堂、天主教堂、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的教堂、佛教廟宇以及薩滿教的圖騰。帝國遼闊的疆域成了商人的樂土，最典型的便是草原的奴隸市場，以及後來伏爾加河流域的路口集市。奧斯曼帝國橫跨三個大陸（歐洲、亞洲和非洲），但20世紀初有些觀察家認為，橫跨兩個大陸的俄羅斯帝國既不屬於歐洲也不屬於亞洲，而是自成一體的第三種存在：歐亞大陸。話雖如此，威尼斯駐奧斯曼帝國大使（阿戈斯托·納尼〔Agosto Nani〕）形容奧斯曼帝國的話——「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一個世界」——也同樣適合俄羅斯。斯大林的統治將會給那個世界帶來巨變、希望和災難。

* 譯註：波蘭語地名，現為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 譯註：德語地名，現為愛沙尼亞首都塔林。

斯大林生在高加索的貿易和手工藝之城哥里。他出身寒微，父親是鞋匠，母親做些漿洗縫補的營生。但是在1894年，他進了高加索第一大城市梯弗利斯的東正教神學院，學習成為一名神父。要是那年有個俄羅斯帝國的臣民睡着了，30年後醒來時就會遇到很多驚人的事情：到1924年，有個叫電話的東西隔着很遠的距離就能實現幾乎即時的交流，車輛不用馬拉也能行駛，人在天上飛，X射線可以看到人體內部。一種新的物理學設想原子內部有不可見的電子，而原子在輻射時會發生裂變。還有理論認為，空間和時間彼此相關，可以彎曲。女人，有的當了科學家，有的炫耀新奇的髮型和服飾，並以此為時尚。小說讀起來是夢幻般的意識流，僅僅描繪形狀和色彩的畫作也會得到很多人的讚賞。¹ 由於所謂的世界大戰* (the Great War, 1914–1918)，全能的德國皇帝下台了，與俄國為鄰的兩大宿敵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消失了。俄羅斯本身基本完好，但其統治者出身卑微，而且來自帝國的邊疆。² 對於我們假想的這位沉睡30年並在1924年醒來的瑞普·凡·溫克爾 (Rip Van Winkle) † 來說，這樣的情形——一介平民，而且是格魯吉亞人，接過了沙皇的權杖——實在是太驚人了。

像斯大林那樣從帝國邊緣地帶走上權力的最高層，雖不常見，但也不是沒有先例。1769年，八個孩子中排行第二的拿破侖·迪·波拿巴 (Napoleone di Buonaparte) 出生在科西嘉。那是地中海上的一座島嶼，前一年剛剛 (由熱那亞共和國) 被併入法國。這個年輕人因而獲得一定的權利，可以進入法國的軍校。拿破侖從來沒有改掉自己的科西嘉口音，可他不但升為法國的將軍，還在35歲時成了法國世襲制的皇帝。平民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的出生地完全在他日後統治的國家之外：他來自哈布斯堡王朝的邊疆，1871年德國統一時把那裏漏掉了。1913年，24歲的希特勒從奧匈帝國搬到慕尼黑，正好趕上加入德意志帝國的陸軍參加世界大戰。1923年，希特勒因為後來的所謂慕尼黑「啤

* 編註：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下同。

† 譯註：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小說中的主人公，他沉睡幾十年，醒來時發現人間已經發生了巨變。

酒館暴動」而犯下叛國重罪，但一名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德國法官無視相關法律，沒有將這個並非德意志公民的人驅逐出境。兩年後，希特勒放棄奧地利國籍，成了無國籍人士。直到1932年，他才獲得德國國籍，當時他是以某種藉口入籍的（表面上是要擔任布倫瑞克的「土地測量員」，而布倫瑞克是納粹黨的選舉根據地）。次年，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走上了成為獨裁者的道路。按照希特勒或拿破侖的標準，斯大林的確是作為他所屬帝國的臣民長大的，因為早在他出生前77年格魯吉亞大部分地區就併入了俄國。儘管如此，他從卑微的邊緣地帶一躍而起仍然是不太可能的。

要解釋斯大林的專政政權，難度很大。他掌握着橫跨11個時區的所有人——戰前最高峰超過兩億人口——的生殺大權，就連沙皇俄國最偉大的專制君主也要自嘆弗如。這樣的權力在年輕的索索·朱加施維里(Soso Jughashvili)*的傳記中是發現不了的。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斯大林的專政統治是一些巨大的結構性力量的產物：俄國專制政治體系的演變；俄羅斯帝國對高加索的征服；沙皇政權對秘密警察的依賴以及與恐怖主義的牽連；歐洲社會主義的空中樓閣；布爾什維主義的地下密謀性質（沙皇專制的翻版）；儘管具備了所有條件，但俄國的極右勢力並沒有發展成法西斯主義；全球性的大國競爭，以及破壞力驚人的世界大戰。沒有這一切，斯大林永遠不可能和權力沾邊。除了這些大的結構性因素之外，還有一些偶然因素，例如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戰爭期間的退位，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1917年取代沙皇的臨時政府的最後一位首腦)的失算，布爾什維主義的許多左翼競爭力量的作為、尤其是不作為，列寧的多次中風和他在1924年1月的早逝，以及布爾什維克中斯大林的競爭對手的自負和愚笨。

還可以進一步設想，年輕的朱加施維里本有可能會像他的眾多鄰居一樣死於天花，或者被巴統和巴庫貧民區中特有的其他致命疾病奪走生命——他在那裏鼓動社會主義革命。警察機關的工作要是稱職，本來是

* 編註：索索是斯大林的暱稱；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是斯大林的本名。詳見第一章。

可以判他到銀礦做苦役 (*katorga*) 的，而許多革命者都在那裏早早地死去了。朱加施維里本有可能在1905年革命後的鎮壓中成為法外處決的一部分，在1906至1907年間被當局絞死（1905至1906年間，有1,100多人被絞死）。³ 或者，朱加施維里也可能由被他戴了綠帽子的很多同志殺掉。即便斯大林在童年或青年時死去，也不會阻止世界大戰、革命及混亂，後羅曼諾夫皇朝的俄國還是有可能出現某種形式的威權主義統治。但對於這位出身卑微的年輕人而言，他出人頭地的決心，他的機詐，他久經磨練的組織才能，將有助於改變1917年以來布爾什維克革命初期的整個結構性景觀。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專政內部殘酷、巧妙而又頑強地建立起了個人的專政。然後，他發動並完成了對整個前帝國血腥的社會主義改造，領導並打贏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讓蘇聯成為全球事務的中心。最終，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一部斯大林的傳記要比其他任何歷史人物——哪怕是甘地或丘吉爾——的傳記更接近於一部世界史。

世界歷史是由地緣政治推動的。在各個大國當中，大英帝國對於塑造現代世界的作用首屈一指。1688至1815年，法國人與英國人爭奪全球霸主地位。儘管法國的陸地面積更大、人口更多，英國卻主要憑藉更勝一籌的財力和軍力成為贏家。⁴ 等到最後與其他國家聯手打敗拿破侖時，英國人已然成為統治世界的力量。此外，他們的崛起恰逢清王朝統治下中國的衰落，這使得英國在政治、軍事、工業、文化和財政上真正成為全球性的力量。經常用來形容帝國疆域遼闊的形象說法「日不落」，最初是與更早的西班牙帝國聯繫在一起的，但這個說法被用在了英國人身上，並與之緊緊相連。不過，到了1870年代，英國統治下的世界出現了兩道裂縫：一是奧托·馮·俾斯麥侯爵 (Otto von Bismarck) 統一了德國——這是由老毛奇用武力實現的。結果，就像閃電一樣，一個實力超群的新強國出現在歐洲大陸；二是日本的明治維新，給一個東亞的新強國注入了強勁的動力。突然之間，帝俄既要在不安定的西部邊界面對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新強國，又要在人煙稀少的東部邊

界面對亞洲最具活力的新強國。俄國進入了一個新世界。這就是斯大林出生的世界。

就連我們稱之為現代性的那一套特徵，也並非某種內在的社會學過程——擺脫傳統——的結果，而是地緣政治惡性競爭的結果。在這種競爭中，一個國家必須在現代的鋼鐵生產、現代的軍隊，以及現代的、以群眾為基礎的政治體系方面，能與其他大國相匹敵，否則就會被碾壓，有可能淪為殖民地。⁵ 保守派統治集團尤其要面對這些挑戰。眾所周知，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那位激進的德國記者和哲學家，對帝俄的影響要超過其他任何地方。但在斯大林一生中大部分時間裏，是另外一個德國人，並且是個保守派，對帝俄的影響最大——他就是奧托·馮·俾斯麥。作為鄉紳，俾斯麥出身於勃蘭登堡東部一個信奉新教的容克家庭，他曾就讀於哥廷根大學，加入過兄弟會(*Burschenschaften*)，並且是出了名的貪酒好色。1862年以前，俾斯麥從未擔任過任何行政職務，只做過駐俄大使和駐法大使。但不到十年，他就成了鐵血宰相，以普魯士為基礎打造了一個強大的新國家。普魯士作為有名的「尋找國家的軍隊」，終於找到了國家。與此同時，這位持右翼立場的德國總理還向各地的統治者展示了如何培育更廣泛的政治基礎、發展重工業和建立社會福利制度，以及如何為了維護現代的國家權力而在一干野心勃勃的大國中縱橫捭闔。

俾斯麥是幾百年一遇的政治家。他巧妙地打敗了德意志諸邦國內外的大量對手，挑起了三次快速、重大但有限的戰爭，先後擊潰丹麥、奧地利和法國，但為了保持均勢，他保留了多瑙河畔的奧匈帝國。如果勝券在握，他就製造攻擊的藉口，或從外交上孤立其他國家，誘使它們發動戰爭。他確保握有備選方案，並且讓這些不同的方案相互競爭。不過，對於德國的統一，俾斯麥根本沒有任何總體規劃，他的計劃乃是即興之作，並且部分是出於對國內的政治考量(馴服普魯士議會中的自由派)。但他不斷地把環境和運氣發揮到極致，突破了結構上的限制，腳踏實地創造了新的現實。「與其說政治是科學，不如說是藝術，」俾斯麥後來說，「這門學科是教不會的。一個人必須具備這方面的天賦。要是執行不當，哪怕是最好的建議也沒有用。」⁶ 他還把政治說成是打牌、

擲骰子一般帶有運氣成分的遊戲。「即便是這個世界上最精明的人，也隨時會像孩子一樣墮入黑暗」，對於自己1864年挑起的丹麥戰爭的勝利，俾斯麥如此評價。⁷他抱怨說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必須推算出一系列很可能發生的和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並根據推算制訂計劃」。俾斯麥不把希望寄託於美德，而是僅僅寄託於權力和利益。這種執政風格日後被稱為「實用政治」(*realpolitik*)。該說法是奧古斯特·馮·羅豪(August von Rochau, 1810–1873)提出的，他是德意志民族自由黨成員，對於1848年未能取得突破、推行憲法感到失望。實用政治原本是指，使用行之有效、切合實際的政治手段，去實現理想主義的目標。俾斯麥的風格更類似於俗話說的「以國家利益為重」——基於算計而不顧及善惡的國家利益。問題不在於原則，而在於目標；不在於是非，而在於手段。⁸俾斯麥遭受到普遍的憎惡，直到他最後取得輝煌的成就，因打敗法國、把奧地利變成附庸、統一德國而被捧到天上。

接着，俾斯麥又同奧匈帝國和意大利組建三國同盟(1882)，與俄國秘密簽訂再保險條約(1888)，得到了萬一發生衝突將保持中立的承諾，因而避免了與法俄兩線作戰的可能性，突出了新德國在歐洲大陸的掌控力。他的天賦屬於密室中的天賦。他講話的聲音不大、不自信，與公眾接觸也不多。此外，他不是統治者，行事要順着國王(和後來的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 I)的意願。在那種極端重要的關係中，俾斯麥憑藉心理上的技巧和韌性，一直有效地操縱着威廉一世，他時而威脅說要辭職，時而又裝模作樣，擺出各種姿態。威廉一世實際上是個勤勉、體貼和聰明的君主，知道甚麼情況下該在政策上聽從俾斯麥的意見，知道該怎樣捋平鐵血宰相豎起的羽毛。⁹為了讓自己顯得不可或缺，俾斯麥的策略是在一定程度上儘量把事情複雜化，這樣一來，就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是怎麼回事(這一點成了他人所共知的套路)。他總是把很多球拋在空中，而為了不讓球掉下來，他就要一邊不停地接球，一邊把更多的球拋上去。還有一點必須記住，俾斯麥得益於當時世界上最好的陸軍(以及或許是排在第二位的海軍)。

歐洲各地其他想要成為政治家的人，把俾斯麥的「政治藝術」當作學習的榜樣。¹⁰毫無疑問，從法治傳統深遠的倫敦的角度來看，俾斯麥是

個威脅。但是從聖彼得堡——那裏的挑戰是找到可以對付左翼極端主義的支柱——的角度來看，他就像救星。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在沒有群眾運動的支持，沒有突出的從政經驗，而且還要面對一批難以對付的利益集團的情況下，通過統一德國擴張了普魯士的勢力，這一點絲毫不遜色於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任何一位領導人最偉大的外交成就。¹¹此外，俾斯麥間接地向自己戰勝過的那位統治者——法國的拿破侖三世 (Napoleon III) ——表示敬意，讓成年男性有了普選權，把保守派的政治命運寄託在農民的德意志民族主義上，以支撐議會的統治。「要是靡菲斯特* 登上講壇宣讀福音，有人會因為這種祈禱而受到激勵嗎？」落了下風的德國自由派報紙憤憤地說道。俾斯麥還鼓動德國的保守派支持廣泛的社會福利立法，從而在策略上戰勝社會主義者。還有一個情況也進一步彰顯了俾斯麥統一大業的重要性，那就是剛剛統一的德國很快就迎來了經濟發展的高潮。這個國家似乎一夜之間就在現代工業的一些關鍵領域，比如鋼鐵和化工，超過了世界頭號強國英國。當英國開始陷入（相對）「衰落」的時候，俾斯麥的新德國卻在推動世界秩序的調整。德國「像一座巨大的鍋爐，」有俄國人評論說，「多餘的蒸汽產生得極快，因此迫切需要有一個出氣口。」¹²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俄國的統治集團，或者至少是其中比較能幹的那部分人，開始癡迷於俾斯麥。成為帝俄另外一隻雙頭鷹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德國人：俾斯麥和馬克思。



斯大林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太熟了。他的父親揍他；東正教神學院壓迫他；他產生了某種「列寧情結」，要超越自己的導師，然後又仔細研究過「恐怖的伊萬」，這一切導致數百萬人慘遭殺害——這種比較陳舊的形象早就沒有甚麼說服力了，哪怕是增加了對俄國政治文化和政治人物分析的高級版本也是如此。¹³ 羞辱的確往往會使人變得野蠻，但斯大林的童年是不是像人們常說的那樣不堪回首，現在還不清楚。他身體

* 編註：浮士德 (Faust) 故事中的人物，引誘人類墮落的惡魔。

畸形，多次生病，卻思想活躍，渴望自我完善，而且顯露出領袖才能。不錯，他是有點喜歡惡作劇。「小索索非常淘氣，」他的夥伴格里戈里·伊麗莎白施維里 (Grigory Elisabedashvili) 回憶說，「他喜歡彈弓和家裏做的弓。有一次，有個牧人正趕着牲口回家，索索跳出來，用彈弓射中了一隻牲口的頭。那頭公牛生氣了，牲口們互相踩踏，待牧人要追趕索索，他卻已經沒影了。」¹⁴ 但和年幼的斯大林熟識的那些同輩表親們，一直跟他保持聯繫，直到他去世。¹⁵ 斯大林的許多老師也活到了能寫回憶錄的年紀。¹⁶ 此外，即使他的童年如同許多人片面描寫的那樣悲慘，這跟日後的斯大林也沒有多大關係。列夫·托洛茨基 (Lev Trotsky) 的做法對我們也沒有多大幫助。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不屑一顧，認為他不過是官僚主義的產物，是個「一般水平的委員 (*komitetchik*)」，也就是說，既趕不上真正的無產者，也不如真正的知識分子 (即托洛茨基)。¹⁷ 斯大林的父母都是農奴出身，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他的家人，包括他飽受非議的父親，都很努力。斯大林的家鄉哥里，常常因落後而受人譏笑，卻給他提供了重要的受教育的機會。

較新的青年斯大林形象——採用了大量新近獲得的原始資料 (包括拉夫連季·貝利亞 [Lavrenti Beria] 1930 年代徵集並塑造的回憶錄)——再現了那位能幹的學生和天才。不過，這些回憶錄也被用來描繪出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傳奇人物，一個富有東方色彩的情種和充滿男子漢氣概的強盜。¹⁸ 這樣做可以增加閱讀的趣味性，也含有一些可貴的新發現。不過，這種新的形象說服力也不夠。青年斯大林血氣方剛，不免沾花惹草。但他不是專門勾引婦女的浪蕩子。馬克思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都有私生子——馬克思和他的女管家有染，恩格斯為了保護馬克思而聲稱自己是孩子的父親——但馬克思顯然不是因此史上留名的。¹⁹ 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 (Saddam Hussein) 也寫詩，但這位伊拉克人在成為巴格達獨裁者的幾十年前，是個真正的刺客。青年斯大林是個詩人，但決不是刺客。他也不是甚麼高加索的黑幫老大，不管貝利亞認為這樣的形象多麼有利於討斯大林的歡心。²⁰ 青年斯大林在不同時期確實吸引過幾個小幫派的追隨者，但時間都不長。實際上，關於斯大林的地下革命活動，最重要的事實是，他在高加索根本沒有打下牢固的政

治基礎。斯大林到首都去的時候，身邊沒有薩達姆·侯賽因的那種「提克里特網絡」(Tikriti network)。²¹經過審慎的檢查可以發現，青年斯大林在設立非法印刷所、煽動罷工和策劃財產侵佔剝奪方面，顯然都取得過成功。斯大林在1907年梯弗里斯大劫案中所起的幕後作用——此事得到庫恩·米克洛什的證實，並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里作了精彩的描述——的確表明青年斯大林為了事業幾乎甚麼都願意做。²²但搶劫本身不是目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正義，連同他自己地位的提升，那是當時的事業。對於成為他終身使命的東西，沒有甚麼會讓他分心，少女、暴力和同志間的友情都不能。

本書不會去作跳躍性的猜測，也不會追求所謂的填補斯大林生平的空白。²³ 本書將小心地穿行於各種活靈活現卻不太可信的傳說中。由於政權的謊言、競爭對手的誹謗和文件的佚失，未來的斯大林在高加索從事地下革命活動的情況是一片混亂。²⁴ 但我們還是可以肯定地說，從社會民主黨隊伍內部的情況來看，認為斯大林特別奸詐地去出賣同志的說法是可笑的。斯大林既專橫(和列寧、托洛茨基一樣專橫)又暴躁(也和列寧、托洛茨基一樣暴躁)。他不會忘記受到的怠慢，這在盛行血仇文化的高加索司空見慣，在自戀者當中也很常見(自戀者是對許多職業革命家的另一種稱呼)。不錯，和大多數人相比，青年斯大林總是引起同事的反感，因為他不管自己的正式任務是甚麼，不管自己的成就如何，總想發號施令，然後又總把自己看作受委屈的一方。斯大林常常是愛交際的，但他同樣是喜怒無常和冷漠的，這讓他顯得疑心較重。通常情況下，對他有吸引力的是和他一樣的人：出身卑微的知識分子新貴。(他「身邊只有無條件尊重他和所有事情都順着他的人」，有位反對者後來寫道)。²⁵ 不過，在1905至1908年狂熱的革命歲月中，實際上青年斯大林主要是個時評家，為一些印數很少的出版物撰寫評論。但那些出版物是非法的，所以他總是東奔西跑，在警察的追蹤下往來於梯弗里斯、巴統、奇阿圖拉、巴庫和高加索的其他地方；此外還有塔墨爾福斯(俄屬芬蘭)、倫敦、斯德哥爾摩、柏林、維也納和歐洲的其他地方，以及歐俄北方的沃洛格達和東西伯利亞的圖魯漢斯克。²⁶ 未來的斯大林有一點比較特別，那就是他從未想過要移居國外。他的早期生活差不多

是地下革命者的典型生活：1901至1917年，總共大約有七年時間是在西伯利亞流放或者在某地坐牢，此外還短期去過幾次國外。尤其是在1908年之後，他窮困潦倒，到處求人施捨，心中忿忿不平，並同其他囚犯和流放者一樣，在百無聊賴中度日。

10 將會成為斯大林的那個人，既是俄羅斯帝國在格魯吉亞駐軍的產物——他父親搬到哥里就是為了給軍隊做鞋子；又是帝國行政官員和神職人員的產物，他們的俄羅斯化措施既讓斯大林有了受教育的機會，也在無意中放大了19世紀後期格魯吉亞的民族意識，而那種民族意識對他的影響是很大的。²⁷ 後來，斯大林的小兒子對他姐姐吐露秘密，說父親年輕時是格魯吉亞人——的確如此。「啊，可愛的國度，鮮花遍地/伊比利亞人的鄉村，充滿歡樂/所以你們，啊，格魯吉亞人，要用學習/把喜悅帶給自己的祖國」，17歲的朱加施維里在他的一首早熟、浪漫的格魯吉亞詩歌（〈清晨〉）中寫道。²⁸ 在人生的頭29年，他只用格魯吉亞文發表文章。「他說的是特別純正的格魯吉亞語，」有個在1900年遇到過斯大林的人回憶說，「他發音清晰，談吐風趣幽默。」²⁹ 當然，至少按傳統的觀點來說，斯大林作為格魯吉亞人實際上有點差勁：過於沒有榮譽感，對朋友和家人不能堅貞不二，不把舊債放在心上。³⁰ 不過，格魯吉亞是個多樣化的國度，未來的斯大林因此才學會了亞美尼亞口語。他還會一點世界語（創造出來的國際主義語言），學過德語（那是左翼人士的母語），但不精通，也讀過柏拉圖的希臘文原典。最重要的是，他的帝國語言——俄語——說得非常流利。結果，這位年輕人不僅喜歡格魯吉亞民族詩人紹塔·魯斯塔維里（Shota Rustaveli）的警句（「親密的朋友原來是比敵人還危險的敵人」），³¹ 還喜歡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悲憫動人、難以言傳的作品——他的《櫻桃園》（1903）描寫了投機商的斧子如何砍倒了小貴族的櫻桃樹（那處莊園和大宅賣給了一個庸俗的資產階級）。斯大林既沉浸在俄羅斯帝國之中，又沉浸在格魯吉亞的歷史中。

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背景之下，除了格魯吉亞人的出身之外，讓斯大林與眾不同的還有他對於自我完善的巨大熱忱。他狼吞虎咽地讀書，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改變世界。或許再也沒有甚麼比他強烈的政治宗派主義更突出了（即便是在一種有多達

三分之一的東正教教徒都支持宗教分裂的文化中)。他在青年時期變成了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跟沙皇制度鬥，還跟其他的革命派別鬥。³² 然而，正如我們將要進行詳細檢視的，最終，對塑造斯大林及其後來的統治最重要的因素，只是他年輕時的部分遭遇，即帝俄國家和專制制度內在的運作、當務之急和幾次失敗。這段歷史涉及面太廣，要理解斯大林的早年生活就要有個適當的視角。但這也為把握他後來的巨大影響作好了準備。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第一章

帝國子民

我的父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但是他們待我很不壞。

11

——斯大林接受德國記者
艾米爾·路德維希 (Emil Ludwig) 的採訪，1931年12月^{1*}

從恐怖的伊萬那時候算起，俄羅斯在四個多世紀裏平均每天擴張50平方英里[†]，最後囊括了以兩洋三海為界的廣大地區：太平洋和北冰洋；波羅的海、黑海和裏海。俄國最終擁有的海岸線長度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俄國的艦隊可以停泊在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爾，（最後）還有符拉迪沃斯托克。^{2‡}俄國的森林將其與歐洲連接起來，俄國4,000英里[§]寬的草原將其與亞洲連接起來，並提供了一個有待發現的「新世界」。

雖然如此，俄羅斯帝國卻幾乎不具備任何存在的先決條件：它的大陸性氣候十分嚴酷，遼闊的開放性邊境（無邊的草原，無際的森林）守衛或治理的成本很高。³此外，帝國的許多地方都位於極其遙遠的北方。（加拿大農業區的緯度總體上跟基輔相當，遠低於莫斯科或聖彼得

* 譯註：《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3-1956）第13卷，第101頁。

† 編註：約129平方公里。

‡ 編註：即海參崴。

§ 編註：約6,437公里。

堡周邊農莊的緯度。)土地雖多，可根本沒有足夠的人手耕種。專制制度依靠被稱為農奴制的一系列措施，逐漸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農民的流動性從未完全消除。農奴可以嘗試逃跑，一旦成功，通常就會作為稀缺的勞力，在別處受到歡迎，但農奴制作為一種強迫性的制度根深蒂固，直到始於1861年的農奴解放。⁴

12 俄國的對外擴張克服了重重阻力，改變了自身的族群和宗教構成。直到1719年，俄國的大俄羅斯人或許還佔70%（其中超過85%都是斯拉夫人），但到了19世紀末，俄羅斯人只佔44%（其中斯拉夫人佔73%左右）；換句話說，大部分人口（56%）都不是大俄羅斯人。在其他斯拉夫人中，小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佔18%，波蘭人佔6%，白俄羅斯人佔5%。還有少量的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芬蘭人、日耳曼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韃靼人、卡爾梅克人和西伯利亞土著。1719年俄國根本沒有猶太人，但18世紀末對波蘭的吞併，逐漸讓猶太人在帝國總人口中佔到大約4%。按照法律，他們應該被限制在以前居住的、遭受吞併的地區（也有例外）——即從前的波蘭—立陶宛王國和西烏克蘭的部分地區，那些地方構成了猶太人居住區。⁵他們不得擁有土地，這讓他們比其他俄國人更加城市化和專業化。雖然歷史的焦點都集中在俄國的500萬猶太人身上，但成為僅次於東正教基督徒的帝國第二大宗教群體的，卻是俄國的穆斯林，他們的存在要追溯到古莫斯科大公國。穆斯林是沙俄出生率最高的群體之一，最終超過1,800萬，佔總人口的10%以上。在俄國的穆斯林中，許多人講波斯方言，但大部分人講突厥語，結果，俄國講突厥語的人比「土耳其」奧斯曼帝國還要多幾百萬。

俄國的領土擴張往往是以犧牲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利益得來的，比如對高加索的征服。那些比阿爾卑斯山還高的崇山峻嶺，像楔子一樣插在黑海與裏海之間，但在山脈兩側，在靠近海濱的地方，有容易通行的狹窄低地，就成了征服的通道。在高加索西部，受奧斯曼土耳其人統治的影響，突厥語長期充當交際中的通用語言；在東部則是波斯語，這是伊朗人統治的結果。1556年，忠於俄國沙皇的軍隊首次抵達裏海——恐怖的伊萬一度娶了一位高加索的突厥公主，但俄羅斯帝國直到1722年才從波斯國王手中奪取了裏海地區的主要定居點巴庫。⁶還有，在

1860年代左右，俄國的將軍才佔領了整個高地。換句話說，俄國人進軍高加索是垂直進行的，實際上是繞着山脈在側翼兜了一個大圈子才上山，整個過程花了150年，犧牲了無數性命。⁷在達吉斯坦（「高山之國」）——那裏跟英屬印度西北邊境的部族相似——鎮壓暴動的俄軍整村整村地屠殺當地人，逼迫他們交出暴動分子，而暴動分子又向當地的穆斯林復仇，指責他們勾結俄國。極具破壞力的還有斯拉夫農民定居者的斧子，他們搬到陡峭但非常肥沃的山谷，毀林種糧，而森林對反叛者至關重要，可以用來掩護。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在1860和1870年代最後的征服行動中，50萬高加索山民大概有40萬逃到或者被趕到奧斯曼帝國。⁸驅逐和屠殺——伴隨着斯拉夫農民的安家落戶——推動了俄國對高加索的同化，未來的斯大林這才生為俄國的臣民。

這種特別的帝國建構，獨一無二，造成了一大堆矛盾。所謂的舊禮儀派，也就是那些因拒絕承認改革後的正教會或俄羅斯國家，被驅逐或逃到「遙遠的」高加索的東正教基督徒，發現他們只有為「敵基督」，即俄羅斯帝國的軍隊提供服務才能生存下去。即便這樣，帝國的哥薩克突擊部隊——曾經自由而狂野的邊民，如今已成為專制制度的聖騎士——仍然長期得不到足夠的給養，為了購買武器，只能求助於他們想要降服的山民。反之，與帝國作對的山民穿着別致的切爾克斯卡（一種羊毛做的長外套，前胸兩側醒目地插着步槍子彈），也被招募到聖彼得堡，做了沙皇的侍從。⁹最大的矛盾也許是，俄羅斯帝國主要是受邀介入高加索的：格魯吉亞的基督徒統治者要同時面對兩個敵人，即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土耳其人和信奉伊斯蘭教的薩非王朝，便請求基督教俄國的保護。「保護」實際上是由附近機會主義的帝國代理人提供的，而且很快就在1801年和1810年採取了兼併的形式。¹⁰俄國終結了格魯吉亞巴格拉季昂王朝，並用俄羅斯正教會的都主教（稱督主教）取代了形式上獨立的格魯吉亞正教會的牧首。可是，另一個矛盾的現象是，當地的「俄國」政府滿是格魯吉亞人，他們因為同是基督徒而得到優待。格魯吉亞精英得益於俄國的統治，獲得了新的強大工具，可以將其意志強加於較低的社會等級和高加索的其他許多民族。帝國就是這樣的，一連串的交易讓野心勃勃的人掌握了權力。

14

在俄羅斯帝國內部，格魯吉亞有它自己的帝業。¹¹ 按照 19 世紀後期的統計數據，850 萬高加索居民，穆斯林約佔三分之一，信奉東正教的佔一半，而在後者當中，格魯吉亞人（就語言來說）只有 135 萬。這個少數民族借助俄國的力量最終佔據了前所未有的統治地位。當然，受制於俄國的宗主權，格魯吉亞人遠非事事順遂。1840 年，在聖彼得堡的帝國當局下令，把俄語作為高加索唯一的官方語言。這之前俄國（1832）阻止了一起企圖復辟格魯吉亞君主制的陰謀（有些格魯吉亞貴族計劃邀請當地的俄國官員參加舞會並殺害他們）。陰謀分子大多被流放到俄羅斯帝國境內的其他地方，但他們很快就獲准返回格魯吉亞，繼續為俄羅斯國家服務，因為帝國需要他們。格魯吉亞精英大多成了親俄派，而且立場基本不變。¹² 同時，新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有助於克服障礙，加快俄國合併的速度。1811 至 1864 年，從弗拉季高加索（意思是「統治高加索」）的低地定居點開始，穿過高高的山隘——在似乎深不見底的峽谷之上——修鑿了一條重要的軍用公路直達首府梯弗里斯。在這個世紀結束前，外高加索鐵路會把黑海和裏海連接起來。最重要的是，工作機會吸引了很多格魯吉亞人學好俄語，而俄語是帝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格魯吉亞人記得並且反覆講述格魯吉亞英勇抵抗俄國征服的故事，但要是可以的話，他們也會同俄國的精英家族聯姻，也會津津有味地欣賞俄國的歌劇，也會渴望得到帝國的制服、頭銜、獎章等可以向人炫耀的東西，還有寬敞的國家公寓、旅行津貼以及作為「禮物」的現金。¹³ 對精英們起作用的東西，下層社會也可以得到，但少一些，他們可以利用機會，前往高加索那些由俄羅斯正教會資助的新俄語學校就讀。好了，這就是未來的斯大林將要攀爬的帝國腳手架——為了與格魯吉亞人合謀完成征服、並借助正教會的力量實現俄羅斯化而搭起的腳手架。¹⁴

小城故事

未來的斯大林的家鄉哥里（意思是「山崗」），坐落在東格魯吉亞馬特克瓦里河（俄語稱「庫拉河」）河谷的連綿高地上，位於三條道路的交匯處，幾百年來一直是商旅的落腳點。三條道路一條向西通往黑海，一條

向東通往裏海，還有一條向北經茨欣瓦利隘口通往草原。¹⁵ 換句話說，哥里一點也不偏僻。在小城的中心，在它最高的山崗上，有一座帶有黃色圍牆的13世紀的要塞。城外還可以見到一些遺址，是17世紀王公貴族的花園，那時的哥里叫做卡特利，是格魯吉亞的首都。不遠處還有著名的博爾若米礦泉水，擔任高加索總督的亞歷山大二世的弟弟在那裏建了一座夏宮。嚴格意義上的哥里，指的是古要塞遺址下方的老城。另外一個城區，即中心城區，有許多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教堂。第三個城區是俄羅斯人的居住區，那裏有帝國駐軍的兵營。¹⁶ 1871年，這個交通要衝成了俄羅斯帝國的鐵路樞紐，連接了高加索首府梯弗利斯和(1828年從奧斯曼土耳其人那裏奪來的)黑海港口城市波季。1870年代，哥里的街道彎彎曲曲，又窄又髒。城裏的居民大概有7,000人，亞美尼亞人佔微弱多數，其餘的是格魯吉亞人，還有幾百個俄羅斯人和一些從附近的部族村落遷來的阿布哈茲人和奧塞梯人。哥里的商人跟伊朗、奧斯曼帝國還有歐洲通商。得益於商人的強勢存在，同樣也得益於正教會，哥里有四所學校，其中一所是教會當局於1818年創辦的兩層樓的教會學校，當時格魯吉亞剛併入俄羅斯帝國不久。¹⁷ 結果，哥里居民的入學率達十分之一，而梯弗利斯是十五分之一——相比之下，整個高加索是三十分之一。¹⁸ 對於出生在那座「山崗」上的男孩來說，通向未來的大門是敞開的。

未來的斯大林的父親維薩里昂·朱加施維里(Besarion Jughashvili, 1850–1909)，俄語中稱作維薩里昂(Vissarion)，簡稱貝索(Beso)，並不是哥里人。貝索的祖父(扎扎〔Zaza〕)是農奴，曾因參與農民暴動而被捕，可能住在奧塞梯人的某個部族村落；貝索的父親瓦諾(Vano)也是農奴，在一個不到500人的名叫季季利洛(「大利洛」)的村子侍弄葡萄，貝索就出生在那裏。瓦諾常把葡萄運到十英里*開外的梯弗利斯附近，但他不到50歲就死了。之後不久，土匪殺掉了瓦諾的兒子、一個小客棧的老闆格奧爾吉，於是，貝索就離開季季利洛，到梯弗利斯找工作。他在梯弗利斯一家亞美尼亞人開的店裏學會了鞋匠的手藝。貝索會說

* 編註：約16公里。

一些亞美尼亞語、阿塞拜疆突厥語和俄語，至於他能不能寫自己的母語格魯吉亞語，現在還不清楚。從現有的材料看，大概是在1870年，在另一家亞美尼亞店主巴拉姆揚茨 (Baramyants，俄羅斯化的名字叫做約瑟夫·巴拉莫夫 [Iosif Baramov]) 的邀請下，當時20歲的貝索搬到了哥里。巴拉姆揚茨有一家製鞋作坊，接受委託給在哥里的帝國駐軍供貨。¹⁹ 俄羅斯帝國需要駐防的地方很大。到1870年，守衛整個西伯利亞的只有1.8萬人，而哈爾科夫、敖德薩和基輔的駐軍有19.3萬人；華沙也有12.6萬人。在英屬印度需要6萬名士兵和1,000名警察的時候，高加索有12.8萬名帝國士兵。那樣一來，就有很多雙腳需要穿鞋。巴拉姆揚茨僱了許多手藝好的鞋匠，其中就有貝索。他似乎幹得還不錯，而且雄心勃勃。在哥里一個人稱「公爵」的釀酒的葡萄種植戶兼酒館 (*dukhan*) 老闆雅各比·「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 (Yakobi “Yakov” Egnatashvili) 的資助下，貝索很快開了自己的鞋店，成了一個獨立經營的手藝人。²⁰

貝索請人說媒，想要迎娶葉卡捷琳娜·「凱可」·格拉澤 (Ketevan “Keke” Geladze)，據說她是個栗色頭髮的美少女，身材苗條，大眼睛。²¹ 同樣，她既是農奴的後代，又是奮鬥者的後代。她的姓在南奧塞梯很常見，這使得人們猜測她還有奧塞梯人的血統，但她像貝索一樣，母語是格魯吉亞語。凱可的父親是個泥瓦匠和農奴，為某個富裕的亞美尼亞人照料花園，住在哥里城外的一個村子，娶的也是農奴，但他似乎在凱可出生前 (或剛出生時) 就過世了。凱可的母親設法讓女兒學會了讀寫，這一點並不多見，因為在那時候，格魯吉亞女性識字的很少。但凱可的母親也去世了，因此，這個姑娘是由她母親同是農奴的兄弟養大的。格魯吉亞的農奴制，即使按照俄羅斯帝國五花八門的標準來看，也非常奇怪：格魯吉亞的大貴族不但有隸屬於自己的神父，還有隸屬於自己的小貴族，而神父也可以有隸屬於自己小貴族。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沙皇國家相當敬重豪爽的格魯吉亞貴族。格魯吉亞貴族佔格魯吉亞總人口的5.6%，而整個帝國的貴族佔總人口的比例是1.4%。1864年10月，高加索開始廢除農奴制，這比俄羅斯帝國的其他地方晚了三年。那大概是在凱可一家從村子搬到哥里的時候。「一路上多高興吶！」

她在晚年對採訪者回憶說，「哥里裝扮得跟過節似的，人山人海。」²² 格拉澤一家解放了，但他們要面對另謀生路的挑戰。

1874年5月，凱可和貝索按照隆重的格魯吉亞儀式，在哥里的聖母升天大教堂舉行了婚禮，迎親隊伍熱熱鬧鬧、風風光光地穿過小城。²³ 貝索的恩人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是伴郎之一。克里斯托弗爾·恰爾克維阿尼神父(Kristopore Charkviani)是他們家的另外一位朋友，據說在婚禮上唱的歌非常好聽，結果雅科夫「公爵」慷慨地給了神父一筆小費：10盧布。貝索跟大多數識字或不識字的格魯吉亞人一樣，可以引用12世紀紹塔·魯斯塔維里寫的《虎皮騎士》中的句子。那是一部史詩，講的是三個有騎士精神的朋友幫助一位少女擺脫強迫婚姻的故事。貝索喜歡像高加索的男人一樣，穿着切爾卡西亞人長長的黑色外套，束一根皮腰帶，套上寬鬆的褲子，褲管塞進皮靴。誠然，就像大家知道的，他會把自己做鞋掙的錢用來買酒；還有，按照當地的習慣，他的顧客常常把自家釀的酒當鞋錢給他。可在凱可看來，儘管他身上有當地男人常有的毛病，這個手藝人還算是上進的。「在我的朋友當中，他被認為是個很受歡迎的年輕人，她們都夢想着嫁給他，」她對採訪者回憶說，「我的朋友們幾乎嫉妒壞了。貝索是個令人嫉妒的新郎，一個真正的格魯吉亞騎士，留着漂亮的小鬍子，穿得十分體面——而且像城裏人一樣特別精明。」貝索，她接着說，可能「與眾不同、古里古怪而且陰鬱」，但也是「聰明而驕傲的」。「在我的朋友當中，」凱可最後說，「我成了那個令人羨慕的漂亮女孩。」²⁴

17

1878年12月，結婚的第四個年頭，夫婦倆有了一個兒子，名叫約瑟夫(Ioseb)，也就是未來的斯大林。當時凱可大概是20歲，貝索28歲。²⁵ 約瑟夫實際上是貝索和凱可的第三個兒子，這在格魯吉亞和東正教傳統中被看作是神的特殊禮物。但他們之前的兩個孩子都沒能活下來。貝索和凱可的頭生子米哈伊爾，1876年初在兩個月大的時候夭折了；第二個孩子(格奧爾吉)死於1877年6月，約六個月大。²⁶ 作為獨子長大的約瑟夫——在格魯吉亞語中的昵稱是「索索」(或「索謝洛」[Soselo])——後來才知道哥哥們夭折的故事。這個三口之家從一個奧塞梯的手藝人那裏租了一間磚木結構的小屋，位於哥里的俄羅斯人居住

區，靠近貝索為其做鞋的帝國駐軍的兵營。小屋只有90平方英尺*，有一張桌子和四把凳子、一張木板床、一把茶壺、一隻箱子和一盞煤油燈。衣服和其他物品都放在開敞的擱板上。不過，屋裏有個地窖，可以從旋轉樓梯下去，那是貝索的作坊和存放工具的地方，也是凱可安頓索索的嬰兒室。²⁷ 換句話說，斯大林的人生是從地下室開始的。

儘管經濟上不寬裕，但朱加施維里一家的故事卻頗有些小城的田園色彩：手藝人、美人和（存活下來的）小男孩。據說凱可從來不讓他離開自己的視線。²⁸ 大約從兩歲開始，索索就不停地患上兒童常見的疾病（麻疹、猩紅熱），凱可擔心再次失去孩子，經常到教堂祈禱。她的奶水不多，索索只好喝鄰居葉格納塔施維里太太以及馬紹·阿布拉米澤——齊哈塔特里施維里（Masho Abramidze-Tsikhitrashvili）的奶水。他就這樣長大了，而且活潑好動。「他是個頑強的孩子，」馬紹回憶說，「母親叫他，要是他不想答應，就不會停止玩耍。」²⁹

地緣政治動盪，代理父親的幫助

18 小索索在格魯吉亞山城滿大街奔跑的時候，是不會注意到更廣闊的世界的，但就在他出生的那十年間，德國在凡爾賽的鏡廳——那裏是法國偉大的太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接待過許多德意志王公的地方——高調宣佈，成立德意志第二帝國。第一帝國是鬆散的神聖羅馬帝國。德國的統一在王公們之間引起的地緣政治動盪，再加上隨後的快速工業化，急劇地改變了俄國的地緣政治空間。不太引人關注但幾乎同樣影響深遠的是，1868年，日本的一群叛亂者推翻了江戶（東京）的德川幕府，為了使自己的叛亂行動合法化而在名義上「歸政」於閒居的、年號「明治」（意思是開明的統治）的天皇。這一過程一點都不順利，因為一些主要地區都反叛了。但是到1872至1873年，日本新領導層的重要成員幾乎全都出使過歐美，不僅親眼見識了先進世界的種種奇蹟，而

* 編註：約8.4平方米。

且發現，先進世界不是鐵板一塊。日本的一些新領導人決定博採各國之長：相比起美國較為寬鬆的教育體系，法國的中央集權式教育體系對他們的吸引力更大，但他們最終選擇的陸軍體系不是法國的，而是由職業軍官和總參謀部組成的德國體系，海軍採用的是英式的。「知識，」明治天皇宣佈，「應當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尋找，並用來鞏固帝國政體的基礎。」這一說法概括了大國長期保持支配地位的秘密。當然，新式學校和從國外輸入的其他東西常常遭到抵制，為此就要借助國家的力量推動轉型。此外，日本隨後的工業化也無法跟德國相提並論。但日本的經濟仍然起飛了，而它作為一個新的強國在俄國側翼崛起，急劇地改變了亞洲的實力均勢。

同樣是在未來的斯大林出生的那十年，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體化的國家經濟體。只是美國剛剛經歷了內戰——內戰造成100萬人傷亡，3,200萬總人口中死亡60萬人。美國還開始採用鐵甲艦、用於偵察的空中氣球、塹壕戰以及射程較遠的步槍。（戰爭切斷了擔任《紐約每日論壇報》特約記者的德國人卡爾·馬克思的收入，因為該報對於歐洲事務不再感興趣了。）不過，與邦聯派的願望相反，北方的紡織廠並不依賴於南方供應的原棉（埃及和印度的種植者可以填補不足）。有些英國政治家，比如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為南方鼓勁，因為他希望削弱美國的實力，但英國政府從未承認邦聯的獨立。要是一個獨立的農業國在美國南方——現代世界最龐大的奴隸體系之一——獲勝並壯大起來，那英國人在20世紀必然失敗，整個的世界發展進程就會徹底改變。1860年，南方奴隸的價值是製造業或鐵路總投資額的三倍，是美國除土地之外最大的一筆資產，但最後獲勝的卻是工業化的北方，不是以奴隸為基礎的種植棉花的南方。1870至1900年，統一後的美國在經濟上完成工業化，規模擴大三倍（得益於來自非英語、非新教社會的大規模移民），形成了一個令人驚嘆的高潮，而隨着美國所佔全球產值的份額飆升到接近30%，就連德國和日本的快速發展相比起來也黯然失色。儘管在菲律賓和古巴發動了殖民戰爭，當時美國這個經濟巨人在很大程度上還游離於世界政治之外。但美國的力量已經開始隱隱約約地籠罩着世界體系，並將成為其中舉足輕重的因素。

這些與斯大林的出生及早年生活有關的重要地緣政治事實——統一的工業化的德國、穩固的工業化的日本、比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都要強大的美國——將會動搖沙皇政權的核心，而且將來也會擺在斯大林面前。當然，年幼的索索·朱加施維里不可能知道正在塑造着他的世界的地緣政治進程。同時，在1880年代的哥里，驕傲的貝索·朱加施維里剛剛做了父親，他似乎幹得還不錯，僱了兩個學徒。兩人中有一個記得，這家人的日子過得好像很一般，吃的東西除了土豆和核桃餡茄子卷 (*badrijani niguzit*) 之外，主要就是赤豆 (*lobbio*) 和扁麵包 (*lavash*)，但在朱加施維里的桌子上，總是可以看到黃油。³⁰ 另一位學徒，只比索索小一歲的瓦諾·胡特希施維里 (Vano Khutsishvili) 有段時間就像收養的兄弟一樣。³¹ 音樂充滿了這個家，凱可總是用複調和聲為索索唱些格魯吉亞民歌。貝索就像大部分格魯吉亞男人一樣，會演奏一些傳統的樂器，比如雙簧的杜讀管 (*duduk*，他在自己的婚禮上演奏過)。不過，貝索好像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現在幾乎找不到描寫他的第一手資料。有人回憶說，他「瘦瘦的，個子中等以上，長臉、長鼻子、長脖子，留有鬍鬚，頭髮烏黑」。後來，也有其他各種各樣的人被認為是斯大林的「親生」父親。但是有兩個親眼見過他們的人都認定索索和貝索簡直是一模一樣。³²

20

不管貝索身為父親做得怎樣，也不管他跟凱可的結合起初的前景如何，這場婚姻解體了。多數傳記作家通常都按照凱可的說法，把婚姻的破裂歸咎於貝索的酗酒和心魔，斷言貝索要麼是個天生的酒鬼，要麼是在他的頭生子夭折後養成了借酒澆愁的習慣，而且一發不可收。³³ 有可能是這樣，但在最初的悲劇過後，尤其是在索索出生後，貝索的作坊好像還經營了一段時間。當然，有可能是他做的格魯吉亞傳統式樣的鞋子競爭不過歐洲的新式鞋子。³⁴ 但也有可能是仍然年輕漂亮的凱可招惹是非，跟一些已婚男人調情：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哥里的酒館老闆和摔跤冠軍；達米安·達夫里舍維 (Damian Davrishevi)，哥里的警官；克里斯托弗爾·恰爾克維阿尼，哥里的神父——他們全都捲入了謠言，被說成未來的斯大林的生父。現在連凱可是否輕浮都弄不清楚，更別說放蕩了。在嫁給貝索這個手藝人的時候，她原本就懷有抱負，因而有可能是她看上了更體面的男人，也有可能是她成了他們的

獵物。³⁵ 目前還缺乏可靠的證據說明未來的斯大林的母親可能與他人有染。不過在當時，關於凱可放蕩的流言在哥里是傳開了。貝索開始罵兒子是「凱可的小雜種」，有一次他好像一邊想掐死自己的老婆，一邊罵她是「婊子」（一個很普通的形容詞）。³⁶ 據說貝索曾經有意砸壞葉格納塔施維里的酒館，並攻擊警察局長達夫里舍維，而達夫里舍維則有可能勒令貝索離開哥里。1884年左右，貝索真的去了梯弗利斯，受僱於亞美尼亞人開的阿傑利哈諾夫 (Adelkhanov) 皮革廠。

不管是誰的錯，這個家總歸是破了。³⁷ 到1883年，凱可和小索索開始了居無定所的生活，在此後十年裏至少搬了九次家，而這還不是這個男孩唯一的不幸。就在父親離開的同一年，小索索染上了天花。那次流行病給哥里的許多家庭都造成了嚴重的創傷，鄰居葉格納塔施維里的六個孩子死了三個。凱可向一位女信仰治療師 (faith healer) 尋求幫助。索索熬過了高燒，但臉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還得了一個綽號「麻子」(Chopura)。有可能就是在這一時期 (1884)，也就是索索六歲的時候，他的左肘和左肩開始畸形發育，影響了左臂的功能。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原因：乘雪橇或摔跤時出了事故；被馬車撞了，接着又因為傷口感染引起血液中毒。³⁸ 索索的確在哥里的羅馬天主教堂附近被一輛 (在哥里) 很少見的四輪馬車撞過，當時或許是因為他和其他男孩在玩膽小鬼遊戲，想要抓住車軸。³⁹ 不過，他的手臂萎縮可能還有遺傳方面的原因。要是那樣，肘部的狀況就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糟。但凱可總是有辦法。為了維持兩人的生活，她為別人漿洗縫補衣服，為他們——包括葉格納塔施維里——收拾屋子，而索索也經常在那裏吃飯。1886年，她和索索搬到恰爾克維阿尼神父家的樓上，而後者是貝索以前的酒友。這次搬家可能是因為窮困所迫，但也可能是另有所圖：凱可懇求恰爾克維阿尼讓索索在1886年秋季——屆時他就快八歲了——進入哥里的教會學校。要是不行，她就央求神父，在神父幾個十來歲的兒子給他們的妹妹——她有可能成了年輕的斯大林的初戀對象——上俄語課的時候，讓索索也參加。

凱可的計劃成功了，當然，那也是因為索索自己上進。傳記作者們經常指出，未來的斯大林是哥里「街頭幫派」的頭目，彷彿在高加索

或是其他地方，街頭奔跑對男青年而言有某種特別的意義。⁴⁰更準確地說，他的特別之處在於對讀書的熱愛和自學能力，這兩點推動着他不斷進步。1888年9月，他在將近十歲時和大約150個幾乎全都七八歲的男童一起，參加了教區學校的預備課程，這是格魯吉亞男童都必須參加的。預備課程要讀兩年，但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將俄語學得非常好，只用了一年時間就通過了。1889年秋天，他開始在學校學習四年的主幹課程，好學和動聽的男中音為他贏得了學校的獎勵——對這個男孩來說，這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結果，至少在白天的部分時間他終於可以擺脫母親的控制了。但是在1890年1月6日主顯節——正教會是當作耶穌在約旦河受洗來慶祝的——期間，一輛失控的四輪馬車在哥里衝進旁觀的人群，而教會學校的唱詩班剛好就站在那裏。第二次挨撞！「索索想要跑到街對面，可沒來得及，」哥里教會學校唱詩班的老師西蒙·戈格利奇澤(Simon Goglichidze)回憶說，「馬車撞到了他，車上的一根連接用的杆子打在他的臉上。」⁴¹索索暈了過去，被人抬到家裏。未來的斯大林在11歲時離死亡有多近，我們永遠無從得知。⁴²馬車夫被關了一個月。幸運的是，戈格利奇澤最後說，車輪只是從孩子的腿上輾過去，不是頭上。⁴³但事故對於未來斯大林的步態造成了永久性的影響，讓他又得了一個綽號——「跛子」(Geza)。

22 貝索好像也回去了，帶着受傷的兒子到梯弗利斯就醫；凱可似乎陪着他們，還在索索康復期間搬到了醫院。⁴⁴有可能就是這件事引發那個被反覆談論的故事，說貝索「綁架」了兒子，因為鞋匠堅決反對兒子上學。⁴⁵事情的真相現在還不清楚。貝索似乎在一年前，即1889年，就已經放出話來，說是**想要**把兒子搶走，不讓他上學，但有可能經人勸說，並沒有那麼做(或者是被迫很快又把兒子還了回來)。但「綁架」也許只是指1890年的這樣一件事，即索索康復後，貝索就把他留在梯弗利斯，讓他在阿傑利哈諾夫皮革廠當學徒。那家大型企業是亞美尼亞大資本家格里戈里·阿傑利哈諾夫在1875年建立的，當時貝索還住在哥里。阿傑利哈諾夫出生在莫斯科，後來搬到梯弗利斯，在1870年代成為梯弗利斯由亞美尼亞人控制的信貸協會的會長。阿傑利哈諾夫工廠裝備了機器，從1885年開始，每年可以為帝國軍隊生產5萬雙鞋

和10萬件毛氈披風。皮革廠的年收入超過100萬盧布，這在當時當地可是一筆巨款。⁴⁶ 貝索和兒子在梯弗利斯老城區租了一間便宜的房子，一起走過馬特克瓦里河上的鐵橋去上班，途中要經過矗立在高峭壁上的中世紀麥捷希教堂，俄羅斯帝國已把那裏改成了監獄。⁴⁷ 像索索一樣，阿傑利哈諾夫的工人很多都是未成年人，通常是成年工人的孩子，他們的父親指望他們多掙點工資，這種做法在梯弗利斯的工廠很常見。⁴⁸ 換句話說，貝索是想讓兒子像他那樣學門手藝，這雖然自私，也算正常。⁴⁹

由於自己父親的緣故，全世界無產階級未來的領袖與討厭的工廠生活產生了最初的衝突。阿傑利哈諾夫的工廠有醫務室，這是梯弗利斯其他皮革廠沒有的福利，但這裏勞動時間長、工資低而且工作不穩定。機械化一方面減少了貝索那種獨立手藝人的收入，另一方面也讓工廠需要的勞動力日漸減少。另外，阿傑利哈諾夫的成年鞋匠是一幫很粗暴的傢伙，會欺負年輕人。索索作為學徒，或許只能給一些老工人跑跑腿，連學習做鞋的機會都沒有。他肯定聞到過潮濕的地下室中腐爛的生皮所散發的惡臭，那可比他母親過去努力照料（卻未能照料好）他的那個地窖的氣味難聞了不知多少。要是索索·朱加施維里繼續待在阿傑利哈諾夫工廠，做一個當學徒的無產者，或者是跑掉，流落街頭，很可能就不會有未來的斯大林了。可正如所有的傳記作者都注意到的，凱可催促她在教會方面的熟人幫她把親愛的兒子要了回去。這一點跟克拉拉·希特勒（Klara Hitler）非常相似。克拉拉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希望兒子阿道夫成為神父，而凱可·格拉澤也相信兒子索索注定要成為正教的神父，這是廢除農奴制為他這種出身卑微的孩子打開的通道。⁵⁰ 這個孩子之所以能回到憑藉嚴格的學習和自我完善向上發展的道路，要歸功於他堅定的母親。

凱可毫不妥協。她拒絕了梯弗利斯教會當局提出的辦法：讓索索繼續跟父親待在一起，同時還讓他加入梯弗利斯教會學校的唱詩班。除了讓索索回到哥里，參加1890年9月開始的下一學年的學習，她甚麼都不願接受。⁵¹ 在一個父權觀念根深蒂固的社會，她能戰勝自己的丈夫，既是因為家人朋友的支持——他們站在這個女人一邊——也是因為

孩子本人的支持；他在父母的拉鋸戰中，在做神父（上學）還是做鞋匠的問題上，選擇了上學，因而也選擇了母親。跟貝索不同，凱可為了讓他有衣服穿，為了讓他交得起學費，願意做任何事情。約瑟夫·「索索」·伊列馬施維里 (Ioseb “Soso” Iremashvili) 是在教區學校操場上摔跤時遇到未來的斯大林的，他回憶說他的朋友「只愛一個人，那就是他媽媽」。⁵² 凱可也愛他。但我們不能把她理想化。她也喜歡發號施令。「斯大林的嚴厲是從他媽媽那裏遺傳的，」後來成了這位專政者衛隊中低級別成員（負責酒和食品）的另一位哥里時代的好友回憶說，「他的媽媽葉卡捷琳娜·格拉澤，是個非常嚴厲的女人，而且總的來說很難相處。」⁵³ 至於貝索，他似乎跟在老婆孩子後面回到了哥里。要是那樣，這可不是他第一次懇求凱可和解了。但1890年索索的康復和在梯弗利斯工廠當學徒這件事，標誌着他們的婚姻最終破裂。⁵⁴ 貝索拒絕給家人經濟上的支持（姑且不論這一說法的真假），而索索在回到哥里的學校後，因為家人無力支付25盧布的學費而被開除了。從現有的證據來看，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叔叔介入，還清了債務。

24 雅科夫叔叔成了索索尊敬的代理父親。⁵⁵ 有件事一直被人們津津樂道，那就是年少的斯大林曾經對一部有名的小說《弑父》（*The Patricide*，1882）十分着迷。小說作者亞歷山大·卡茲別吉 (Aleksandre Qazbegi，1843–1893) 是格魯吉亞王公的後代（他的祖父參與過俄羅斯對格魯吉亞的兼併，為此得到了一座山作為采邑）。被卡茲別吉的小說當成靶子的俄羅斯帝國當局將其列為禁書，結果反倒大大增加了它的吸引力。小說中，農民的兒子亞戈 (Iago) 和一位美麗的姑娘努努 (Nunu)，不顧家人的反對墜入情網，但是，一位與俄羅斯帝國勾結的格魯吉亞官員姦污了努努，以捏造的罪名把亞戈關進監獄。亞戈最要好的朋友柯巴 (Koba) 是一個勇敢、寡言少語的山民 (*mokbeve*)，他發誓要報仇——「我要讓他們的母親哭泣！」——於是就為亞戈策劃了一次大膽的越獄行動。然而那位格魯吉亞官員的手下殺害了亞戈。努努也悲傷而死。立誓復仇的柯巴追蹤並處死了那位囂張的官員——「是我，柯巴！」——大致合理地伸張了正義。柯巴是小說中唯一的倖存者，比他的敵人和朋友活得都長。⁵⁶ 在青年斯大林的幾十個化名——包括短暫用過的貝索施維里 (Besoshvili，意

思是貝索的兒子)——之中,「柯巴」用的時間最長。「他把自己叫做『柯巴』,而且不讓我們叫他別的名字,」兒時的朋友約瑟夫·伊列馬施維里回憶說,「當我們叫他『柯巴』的時候,他的臉上就會露出自豪、愉快的神色。」⁵⁷這就是那個男孩。關於他,有個朋友回憶道,「作為他的朋友,我們經常看到索索……左肩略微前探,右臂稍有點兒彎曲,手裏夾着香煙,急匆匆地穿過街頭的人群。」復仇者「柯巴」(在突厥語中有不可屈服的意思)肯定要比「麻子」或「跛子」聽起來讓人舒服。但有必要強調的是,索索·朱加施維里的代理父親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的綽號也叫柯巴,那是他的格魯吉亞名字雅各比(Yakobi)的呢稱。

貝索的缺點我們已經說得太多了,而雅科夫·「柯巴」·葉格納塔施維里的支持卻說得不夠。索索·朱加施維里早年生活中的暴力也說得太多了。貝索打兒子是因為憤怒、屈辱或者根本就沒有原因;寵愛孩子的凱可也打兒子。(貝索打凱可,凱可有時也因為貝索喝醉了而把他痛打一頓。)⁵⁸自然,人性中的相當一部分被父母一方或雙方打沒了。哥里並沒有某種特別暴力的東方文化。當然,在一年一度的復活節前一週禮拜一的紀念儀式上,為了讓人重溫1634年趕走波斯穆斯林的場面,夜裏必定會有一場全城參與的赤手空拳的打鬥。小城按族群分成不同的隊伍,拳手的數量達到上千人甚至更多,而為這種鬧哄哄的比賽擔任裁判的是一些喝得醉醺醺的神父。在成人加入之前,孩子們率先揮動拳頭,而這裏面不會少了索索。⁵⁹但這種節日期間的暴力——魯莽地揮拳互毆,繼而草草地互相擁抱——是俄羅斯帝國的一大特色,從烏克蘭的市鎮到西伯利亞的村莊都是如此。哥里也絲毫不顯得突出。而且年少的斯大林所從事的其他一些暴力活動在男孩當中也很常見。摔跤比賽在哥里很受歡迎,而在操場的學生當中,瘦削而肌肉發達的索索雖然左臂萎縮,可力氣大得很,據說打起來十分勇猛——就是手段有點骯髒。據說即便是同最強壯的對手較量他也不會發怵,雖然偶爾會被打得暈頭轉向。但索索顯然是想贏得同他有名的代理父親一樣的名聲,因為在其族長的帶領下,葉格納塔施維里的族人都是哥里的摔跤冠軍。「小斯大林的拳擊和摔跤都小有名氣。」警察的兒子約瑟夫·「索索」·達夫里舍維(Iosif “Soso” Davrishevi)回憶說。⁶⁰

相比之下，貝索的軌跡卻在繼續下行。在讓兒子重新回到阿傑利哈諾夫皮革廠的努力失敗後不久，他似乎就離開了那裏。他想在梯弗里斯亞美尼亞人的巴扎(bazaar)*擺攤修鞋碰碰運氣，好像也不成功。之後關於他的生活就沒有甚麼可靠的消息了；有人說貝索最後成了流浪漢，也有人說他在一個補衣店裏繼續幹着老本行。⁶¹未來的斯大林後來輕描淡寫地說到自己的「無產階級」出身，說那是因為他父親的社會地位每況愈下造成的。「我父親並非生來就是無產者，他開過店，收過徒，他是個剝削者，」1938年3月，他對紅軍指揮員說道，「我們生活得一點也不差。在我十歲的時候，他甚麼都沒了(razorilsia)，成了一個無產者。我要說的是，他對於成為無產階級的一員並不高興。他一直抱怨說他的命不好，成了無產者。但對他來說是不幸的事情，讓他變得一無所有的事情，卻成了我的一個優點(zasluga)。真的，這是件有趣的事情(笑聲)。」⁶²事實上，貝索的名字從來沒有從季季利洛村社的名冊上劃掉，因此，他仍然是農莊的一員，貝索也把這一法律地位傳給了兒子(直到1917年，斯大林在沙皇政府國內通行證上的記錄都是如此)。這位未來的蘇聯領導人雖然從法律上來講是個農民，並且在事實上是工人的兒子，可他本人卻在凱可和雅科夫「叔叔」的支持下，地位不斷上升，進入了小知識分子的行列。

對上帝的信仰

1890至1891學年回到學校時，索索因為馬車事故而不得不留級，但他以更大的決心投入到學習中。據說他上課從不遲到，空閒時候都在埋頭讀書——這些後來的回憶，聽上去像是真的。⁶³「他很能幹，總是第一個到班上」，他以前的一位同學回憶道，還說「他在所有的遊戲和娛樂活動中〔也〕都名列前茅」。有些同學還回憶說，當一些格魯吉亞男孩因為講母語而受到責罰面壁思過的時候，索索顯得很不服氣；有

* 編註：集市、農貿市場。

些人記得，他毫不害怕為了別的同學去找身穿威風凜凜的國家制服（帶有金鈕扣的短上衣）的老師交涉。要是索索真的代表別的男孩跟老師交涉，有可能是因為他被綽號「憲兵」的俄語老師挑選為班長，負責加強紀律。作為中間人，不管他扮演了甚麼角色，所有老師，包括格魯吉亞族的老師，都喜歡索索的勤奮和熱心。⁶⁴ 他會唱俄羅斯和格魯吉亞的民歌，還有柴可夫斯基的歌曲；他學習教會斯拉夫語和希臘語；他被選中在教堂朗誦祈禱詞、唱聖歌。在學校獎勵給他的大衛〈詩篇〉上有這麼一段贈言：「因進步突出、行為優秀和在『詩篇』的背誦方面表現優異而獎給約瑟夫·朱加施維里。」⁶⁵ 有位同學對索索和唱詩班的其他男孩大加讚賞：「他們穿着白色的法袍，跪在地上，仰起頭，用天使般的聲音唱着晚禱，而其他男孩則匍匐在地，心中充滿來自天國的喜悅。」⁶⁶

事情也有平淡的一面：儘管凱可一度在當地一家「高級」服裝店做過正式的女裁縫，最後在一間公寓（位於哥里的教堂大街）安頓下來，為了維持開銷，她要為學校打掃衛生（每月10盧布）。可能還在校長家裏做過傭人。⁶⁷ 但索索很快就因為學業優異而被免去學費，而且每月還能得到一些津貼，開始是3盧布，後來漲到3.5盧布，再後來漲到7盧布。這或許是最好的證據，說明這個單親家庭的孩子當時表現十分突出，是哥里最優秀的學生之一。⁶⁸ 1894年春天他畢業時年齡已經很大了，15歲半。他本可以更進一步，繼續到哥里師範學校學習。擺在面前的還有一個更好的選擇：唱詩班老師西蒙·戈格利奇澤即將調到梯弗利斯的沙皇亞歷山大師範學校，說他可以把自己在哥里的明星學生帶去，而且可以享受到夢寐以求的全額國家獎學金。這對一個貧困家庭來說非同小可。可索索參加了梯弗利斯神學院的入學考試，想要成為神父。他在考試中幾乎科科優秀——《聖經》、教會斯拉夫語、俄語、教義問答、希臘語、地理、寫字（雖然算術不行）——獲得了錄取。夢想成真。梯弗利斯神學院，還有那座城市招收富家子女的世俗的精英高中，是高加索的最高學府，因為俄羅斯帝國政府不贊成在那裏辦大學。神學院六年的課程（通常從14歲開始）下來，至少可以做一名教區神父，或者在格魯吉亞農村做一名鄉村教師；對於那些還想往高處走的人來說，則可以把神學院作為跳板，到帝國其他地方讀大學。

由於弗洛伊德學說的傳播，傳記作品普遍開始突出苦難童年的影響。⁶⁹哪怕是對於那些真的有過苦難童年的人來說，這種做法也顯得過於牽強。未來的斯大林的童年當然很不容易：疾病和事故，被迫搬家，經濟困窘，不爭氣的父親，關愛自己但十分嚴厲、謠傳是妓女的母親。但在成年之後，當這位專政者內心充滿怨恨，而那種怨恨又將決定他大部分革命同僚命運的時候，他並未對父母以及自己早年的經歷表示過特別的憤怒。克里姆林宮未來的領導人沒有經歷過恐怖的伊萬或彼得大帝 (Peter I) 童年時經歷的那種血腥的宮廷陰謀（雖然他常把自己同他們相提並論）。伊萬三歲的時候父親生癩子死了，七歲的時候母親死於暗殺。恐怖的伊萬這位（讓攝政們弄得）成了孤兒的沙皇淪落到乞食的地步。親眼見到精英們以自己的名義爭權奪利、互相殘殺，讓伊萬擔心自己也很快會悲慘地死去。年輕的伊萬喜歡剪掉鳥的翅膀，喜歡把貓和狗扔出屋子。彼得大帝四歲時沒了父親。那以後，這個孩子的性命就處在同他父親的兩個寡妻有關的敵對宮廷派系的威脅下。彼得十歲時成為沙皇，落敗的一派發動叛亂，年少的他目睹母親的親戚和朋友被扔在舉起的長矛上。有些分析家的確是誇大了伊萬和彼得可怕的童年，為他們常常是殘忍的統治提供了偽心理學的解釋。不過，對於年少的朱加施維里，充其量只能說，他或許看到過父親曾經拿着刀追趕自己的母親。

同伊萬和彼得的經歷相比，未來的斯大林的童年苦難算得了甚麼？再來看看謝爾蓋·科斯特里科夫 (Sergei Kostrikov) 早年的生活吧，他後來在革命時的化名是基洛夫 (Kirov)，而且成了斯大林最親密的朋友。1886年出生於俄國中部維亞特卡省* 一個小城的基洛夫，後來被認為是斯大林當政時期黨的領導人中最受歡迎的人之一，但他的童年十分艱難：七個兄弟姊妹有四個在嬰兒時就夭折了，父親是個不顧

* 編註：此處「省」所對應的原文「province」，指代了俄語裏兩個不同的行政區劃概念：一是 guberniya (英文翻譯為「province」或「governorate」，中文翻譯為「省」)，一是 oblast (英文為「province」，中文為「州」或「省」)。對於原文中的「province」，作者指明為 oblast 的幾處翻譯為「州」，其他均翻譯為「省」。

家人死活的酒鬼，母親死於肺結核時，他只有七歲。基洛夫是在孤兒院長大的。⁷⁰ 格里戈里·「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 (Grigol “Sergo” Orjonikidze)，斯大林的核心圈子中的另一位重要成員，身世也差不多。他的母親在他還是嬰兒時就去世了，十歲時，父親也去世了。相比之下，年輕的斯大林有一個寵愛他的母親，還有就像許多關於那一時期的回憶錄提到的各種各樣的良師。凱可娘家的很多人就住在附近，包括她的兄弟吉奧 (Gio) 和吉奧的孩子們 (凱可的另一個兄弟桑德拉 [Sandala] 後來被沙皇警察殺害了)。而即便是貝索在1890年的監護權大戰中失利之後，貝索家族的人 (他姐妹的孩子) 和斯大林也還有來往。⁷¹ 家庭是格魯吉亞社會的黏合劑，索索·朱加施維里不但有他自己的大家庭，還有葉格納塔施維里一家 (和達夫里舍維一家) 給予的代理親屬關係。小城哥里的人互幫互助，形成了一個聯繫緊密的共同體。

除了大家庭和哥里的學校教育 (那是向上的通道)，未來的斯大林的童年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可取之處：對上帝的信仰。他極度貧困的家庭必須每年給正教神學院交付昂貴的學費 (40 盧布) 和食宿費 (100 盧布)，還有作為校服的白色法衣的費用。16 歲的朱加施維里申請並且獲得了部分獎學金：食宿免費。⁷² 凱可為學費的事情向索索的代理父親柯巴·葉格納塔施維里求助。大柯巴既然有錢把存活下來的兩個親生兒子送到莫斯科上中學，自然也供得起小柯巴 (索索)。但是，如果富有的葉格納塔施維里等人停止對索索的支持，或者神學院的俄羅斯人院長取消了部分國家獎學金，朱加施維里的學業就會陷入困境。他冒着很大的風險，拒絕了唱詩班老師戈格利奇澤安排的世俗師範學校的全額獎學金。這其中的原因想必在於，不僅凱可是個虔誠的人，就連她的兒子也是。「在他上學的頭幾年，」蘇聯時代出版的一本回憶錄承認，「斯大林是個非常虔誠的信徒，參加所有的宗教儀式，參加唱詩班……他不僅遵守所有的宗教禮儀，還總是提醒我們要去遵守。」⁷³ 在神學院的修士中間學習，或許未來的斯大林自己也想成為修士。但在俄羅斯帝國以及更廣闊的世界中發生的變化，開啟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⁷⁴